

## 大力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合作

据新华社电 6月4日至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入推进文化改革发展,进一步树立开放意识,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推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文化产品走出去,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刘奇葆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要着力改善文化民生,按照全覆盖、保基本、促完善

的要求,深入实施重点文化惠民工程,采取“反弹琵琶”的方式,推动文化资源向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和农村倾斜。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充分挖掘丰厚的民族文化资源,大力发展具有时代特色和壮乡风格的文化产业,积极发展旅游文化产业。

刘奇葆指出,要充分发挥广西面向东盟的优势,拓展文化交流的内容形式,用好“广西文化舟”经贸文化合作论坛等渠道和平台,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东盟、走向世界,为广西开放发展营造良好文化环境。要更多地依靠市场和企业的力量,完善支持文化产品

和文化服务走出去政策措施,推动文化产品特别是图书、影视类拳头产品走出去,努力扩大在周边国家文化市场的份额。

刘奇葆强调,要深入开展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创建活动,引导人们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保护自然,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要大力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建立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和运行保障机制。要深入开展公益广告宣传,提升质量水平,加大刊播力度,扩大公益广告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更好地展示文明新风,弘扬社会正气。

文学界关注“70后”作家的创作新变

## “他们比想象的更有力量”

□本报记者 李晓晨

今天,当人们谈起“70后”作家时可能会露出迷茫的表情——他们是谁,写了什么,写得如何……可要是说起“50后”、“60后”和“80后”作家,便不会有如此多的空白。很长时间以来,“70后”作家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被前后几代人遮蔽,尽管他们始终在以文学的方式存在并思考着,从个体出发探寻人与世界的关系。

其实,自上世纪90年代“70后”作家首次引起批评界关注至今,这一阵营已经出现了一大批颇具实力的作家,卫慧、周洁茹、棉棉、朱文颖、金仁顺、戴来、魏微、安妮宝贝、阿乙、曹寇、路内、梁鸿、徐则臣、盛可以、鲁敏、乔叶、冯唐、李师江、计文君、付秀莹、慕容雪村、李修文、张楚、李浩、东君……这个创作群体内部蕴涵极为丰富和复杂,他们遭遇了时代生活和文学内部的巨变,因而创作本身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作为承上启下的“中间代”,他们正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并为日后成为真正的“中坚代”而积蓄力量。

为了梳理青年作家的创作态势和创作成果,总结青年作家尤其是“70后”作家的艺术特色和风格,有针对性地发现问题、寻求对策,6月5日,青年创作系列研讨·“70后”作家的新变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出席会议并讲话,30多位在京评论家及专家学者与会研讨。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梁鸿鹰主持会议。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共同主办。

### 怎么就成了“边缘人”

许多人喜欢用如下说法来界定“70后”作家——边缘人、“零余者”、离散的一代……这基本概括了他们如今的状态,用胡平的话说,有点上下不够不着、文学市场两边不讨好的意思。往前,他们有着赶上纯文学的兴盛,“50后”、“60后”便在那时脱颖而出;往后,他们又被市场经济下崛起的通俗文学所看重,而这已经是“80后”名声大噪的时代了。这逼迫他们进行着“马拉松式”的写作,无法寄希望于机遇的突然到来,而必须通过具有大气象的作品来突围。

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是一个属于“70后”的故事,张颐武认为,影片中的男生张开便是对眼下“70后”作家最恰当

概括。“张开坐在坟地边怅然若失,这一代作家也是如此,他们是坐在坟地边上写他们的自传。”工业化、城市化让他们无所适从,因此笔下的人物多是晃来晃去的多余人,与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有相似之处。作为在纯文学濡染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试图用现代主义去驯服资本入侵带来的一切,解决无法确立自身位置的焦虑。尽管创作实绩摆在那里,但从整个文化视野来看,还没能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文化价值。

“漂泊在外,无家可归”是陈晓明对“70后”作家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与历史和文学离散的一代人。与前辈相比,他们失去了反抗的对象和资源;与后来者相较,他们又与消费社会隔着一层。与其说是他们逃离了中心,倒不如说是被放逐的一代。每个人难以归类,是不能够被归纳以及拒绝被归纳的一代。“漂泊在外,无家可归”是他们写作的特点,也体现了其写作的意义。

“70后”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固的、常态化的社会中,并未经历过那些改变国家民族命运的历史事件,同时他们又从上世纪90年代多元开放的氛围中获取了思想给养。梁鸿谈到,这一代人在当时缺乏对历史的自觉,所以经历了从历史的“不及物”到“及物”的过程,“在关注历史时开始意识到历史是多元化的,不仅是大事构成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的历史、小事件的历史。我们有时可能缺乏自信和胆识,因为大量阅读经典让我们更加不确定自己的位置和水准”。

### “70后”作家变在何处

不管主动还是被动,“70后”作家都呈现出了低调的特点,他们在夹缝中寻求生机,在压力中默默进取,在坚持写作中站稳脚跟,并逐渐显现出特点。而从上世纪90年代被命名至今,这一代人的创作本身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以前的作家解决的都是怎么才能吃饱的问题,这代人开始关注吃饱了以后怎么办”,李洱认为,这是以往中国哲学和文学中从未处理过的经验。这与郭艳提出的“在衣食无忧之后如何面对物质主义生存”的话题不谋而合,“从传统到现代的现代性是这一代作家所关注的”。

施战军提出,“70后”作家的最大特点是带着体恤和理解看待人并思考“人何以如此”。在此之前,“50后”善于追问“我是谁”,“60后”则关注“我怎么了”,“70后”发现了一个很好的写作方向。他们把关注点聚焦到个体生命上,不针对所谓的社会历史风云,而转向文学本该关注的个体生命的遭遇,这正是经典性写作的特征。

写个体遭际并不意味着只停留在生活的小切口处,对此,李云雷谈到,“70后”从关注生命的疼痛感扩展到了更广阔的中国经验、公共话题,并对其进行有生命感的描述。创作越来越具有历史感,他们以虚幻、有意思的方式处理并非亲身经历过的历史,表达这代人对历史的非理性。

写自己曾是这代作家熟悉的路子,然而随着写作经验的积累,有的人已经不满足于此。岳岳发现了两个值得关注的变化,一是以自我为桥梁观照他人,比如在《拆楼记》《胡文青传》里,对他人的理解就变得无比重要;而更勇敢的一步,是他们以正面强攻的方式直接进入历史,探究社会之所以如此的成因。或许,这代作家最终将告别“经验个人”,走向一个更广阔更繁复的世界。

从写作走向创作,或许是“70后”成熟的标志。杨庆祥谈到,这代作家正从自我抒发走向对文学史书写的延续和重写,向更本源性的问题提问思考。比如《六人晚餐》试图追问大时代格局下人的孤独与隔膜,阿乙的短篇对人性复杂进行探究。与这些内容题材相联系,小说也必然在体裁、形式上出现新的探索。

深受现代主义影响并继承了先锋文学遗产的“70后”,其审美和艺术风格与前辈也有不同。白桦以平民视角、冷峻叙事、游戏因素来概括。平民视角随处可见,求学者、小文人、都市白领、无业游民等大量进入作品。冷峻叙事源于作家清醒与怀疑融合的态度,他们不盲目歌颂、不抽象畅想。因为更看重“意思”而非“意义”,把游戏性因素带入了文学写作,从而扩展了文学的表现力与感染力。

张柠认为,“70后”作家的出道带有半商业半文学色彩,李师江、盛可以、徐则臣都是如此。《妹》等在写生活时带有一股狠劲,而李师江对物体有着独特体验和描摹,显示出高超的叙事能力,《跑步穿过中关村》写“北漂”生活呈现出了这代人的精神变

异。他们不是时代的参与者,而是观察者和思考者。

### 他们是未来的中坚力量

无论从年龄还是作品来看,此时此刻的“70后”作家都处在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创作阶段。他们接续了正统的文学传统,汲取了中外文学经典的营养,经历过文学期刊的淘洗和训练,经受了市场大潮的洗礼,对历史和自我都持有审视的态度,目前仍坚定地朝着选择的方向前行。毋庸置疑,他们将是当代文坛未来的中坚力量。

“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力量”,李敬泽对“70后”作家给出了这样的评价。他认为,这一代作家的创作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他们有力构成了当代文学的中间地带。因此,他们的境遇以及在中国文学创作版图中的格局和出路,应该引起评论界和理论界的关注。眼下,这样一批作家正逐步显示出真正的力量,他们以创作实绩提醒着所有人,其最好的作品正在创作中,对这个群体进行整体考察和估量,对启发他们的创作并由此带动更多青年作家的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孟繁华认为,这么多年之后,“70后”作家具有了不可忽略的文学地位。他以几位作家为例论及其创作成果。他说,魏微的中短篇小说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和艺术的疏异性;李师江的小说纠正了现代小说建立的“大叙事”的传统,个人生活、文人趣味等被重新镶嵌于小说之中;鲁敏既写过去也写现在,她关于“东坝”的叙述已经成为小说的重要部分;东君写与当下似乎没有多大关系的故事,但就在看似不经意的故事中,表达了他对世俗世界无边欲望的批判;计文君的小说则典雅、端庄,既有中国古典文化的气息,也融合了西方20世纪以来小说的技法和元素。

“他们毫无疑问是会出大作家的”,吴义勤说,批评界还没有对他们给予足够的重视,用一个统一的名称来命名去了解、认识他们提供了许多便利,但也会遮蔽个体的特色,所以还是应该更重视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评论。这一代人告别了极端化写作,从而使文学呈现出更多可能性,假以时日,他们一定能写出让读者铭记的优秀作品。

本报讯 日前,由陕西省作协倡导牵头,陕西文学院、巴金文学院、重庆文学院共同组织的陕川渝三地作家走进新陕北采风创作活动举行。来自三地的40余位作家走进延安、榆林的革命历史遗址、能源化工企业以及民俗文化基地进行考察,行程达2000公里。活动旨在带领作家深入一线,充分发掘陕北丰富的文化资源,大力弘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抒写陕北的历史与今天,促进三省作家的文学交流。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景俊海为作家们送行,将印有“陕川渝三地作家走进新陕北”的大旗,交给本次作家采风团团长、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蒋惠莉。5天的采风活动中,作家们细心观察、用心体会,收获颇多。当他们看到陕北的绿化、治沙工作成就,看到陕北能源重化工基地的新风貌时,不禁为陕北人民创造出的丰硕成果而骄傲;当他们登上宝塔山,走进绿荫掩映的杨家岭革命旧址,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徜徉时,那红色历史的悠远呼唤和朴实无华的民情民风让他们深受感动。

作家们表示,陕北曾是中国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蕴藏着丰富的民间文化。这次采风让他们看到了陕北的新变化,特别是近年来这里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在国家“再造秀美新陕北”的战略部署下,这里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局面。采风中的所见所闻为作家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与此同时,本次活动将陕川渝三省作家汇聚在一起,为他们提供了相互学习借鉴的机会,大家表示今后会把收获融入到创作中去,创作出更多优秀的文艺作品。

(李子白 贾英)

## 河北文学院启动文学导师辅导制度

本报讯 近日,河北文学院召开文学导师第一次工作会议,正式启动文学导师辅导制度。十余名作家、评论家和编辑接受聘书,成为河北文学院第一届(2013—2014)文学导师。河北文学院一贯注重青年作家培养。为更好发挥自身职能,促进人才成长和创作繁荣,河北文学院自2013年起开始实施文学导师辅导制度,通过聘请有经验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对签约作家进行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的跟踪指导,为青年作家的成长提供更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文学导师将对签约作家进行一对一辅导,审读作家作品,提出修改意见,并针对作家创作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开展专题讲座。

与会者认为,文学院实施文学导师辅导制度,对签约作家的创作有很好的助推作用,可以及时发现作家创作中存在的不足,防止作家少走弯路。导师辅导要充分尊重作家的创作个性,因势利导,使作家更好地发挥创作个性,并争取形成鲜明的创作风格。大家还就实施文学导师辅导制度的具体措施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卫玮)

## 用中国味道的文字写中国人的困境

□本报记者 刘 颖

《带灯》是贾平凹继《古炉》之后又一部立足乡村世情的小说。自出版以来,该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小说主人公带灯是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她容貌美丽、孤芳自赏却又有点不合时宜。她主要处理乡村所有的纠纷和上访事件,在矛盾中履行着乡镇干部的职责,每天面对让人无法摆脱的杂乱沉重,内心却不断向上升。小说出版后,关于作者面对现实的态度、关于理想如何呈现、理想存在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等,都成了争论的话题。

### 注重中国经验的表达

贾平凹擅长从一粒沙、一滴水里看世界,从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发现世界的秘密。十多年来,贾平凹以他的作品描绘巨幅的、动态的乡村画卷,在书写乡土的崩溃时深藏着作家的人文感怀。雷达认为,贾平凹始终在自己的小说中探索着乡土中国的出路,他进入生活内部的深度在当代是无人能及的。《带灯》是一部有着理想之光的作品,带灯的形象是有情怀、有韵味的。这也是一部正面凝视解读现实的作品,作家对现实社会的尖锐批判隐藏在生活细节中。因此,这是一部注重中国经验的表达、探索民族灵魂的作品。

吴俊认为,贾平凹是写乡土的代表性作家,但他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写乡村,更在于他对中国乡村的百科全书式的呈现。《带灯》表明了作家对当下中国政治、人性的思考,是一部反映历史、现实、人文关怀都很突出的作品。《带灯》呈现了众多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李星认为,《带灯》的价值在于这部作品摆明了尖锐深刻的权力批判立场。贾平凹在

注视痛苦的现实的时候,没有仅仅满足于对现实进行揭露和批判,而是以“一星弱火”,以深切的人文关怀显示出他优雅地超越现实局限的能力。

10年4部长篇,贾平凹的创造力的确让人叹服。白桦认为,《带灯》激活了贾平凹的创作,作品的背景放在了新的经济发展点上,表现的是当下的农村生活。作品对当下社会问题、生活的把握值得重视,尤其是对当下社会分离、分化、裂变带来的变化,作者的表达和思考令人尊重。

李云雷说,带灯是一个在乡镇的政治生活中处于边缘的人物。她只是一个参与者而不是一个主导者,写带灯这个人物,小说重点不是描写这个乡镇的政治生活,而是带灯自己的日常生活以及她生活的整体状态,所以它的视野比一般的描写乡镇干部的作品要宽广。

畅广元认为,《带灯》是一部隐喻性很强的作品,带灯就是一个隐喻,作品的意图并不在于简单的对社会和现实的批判,更在于呈现一个灵魂的层层自救,因此是一部拷问灵魂的作品。

### “日子结构”与中国审美传统

与贾平凹以往的小说相比,《带灯》呈现的中国经验的变化很明显,《带灯》在结构和写法上的坚持也很明显。谢有顺认为,与当下很多作家都在讲一个好故事不同,贾平凹走了一条不同的路。他写的小说不求好看,写法上依赖细节,以细节的洪流来推动叙事。他的小说呈现出一种“日子结构”的特点,以庞大的篇幅描述短暂的时间里生活,这种写法在传统的模子里融入了现代

性的思考。与此同时,贾平凹的小说表现了他对价值观的反思。现代城镇快节奏的发展是这个时代一种强硬的价值观,它时刻摧毁着传统中国田园的、封闭的价值观,而小说正体现了对这种传统价值观的怀念。

吴俊认为,贾平凹深谙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法,《带灯》以多个焦点呈现乡土中国的变化,是最见文学功力的一种写法。同时,贾平凹熟练地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学的“虚写”与“实写”手法,在虚实的转换中使一部直面现实的充满戏剧性的作品具有了空灵、飘逸的艺术品质。作品在拉开距离散点透视中体现了作家的价值立场,在乌托邦的一点微光中喻示着作家对现实的批判。

李云雷认为,《带灯》显示了贾平凹用情去面对尖锐现实和问题的拓展和努力。小说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容纳了更多比较尖锐的社会问题,比如上访、砂肺病、生态问题还有最后的斗殴。二是有情感地去把握带灯这样一个个人对待周围人和事物的态度,不是用一种功利或者纯理性的态度去面对。

李遇春认为,贾平凹的小说是反抗时间的,它要求读者回到属于文学的空间去阅读。小说就是闲聊,从情节流向生活流、细节流,并融入意识流的手法。带灯的26封信就是意识流。因此《带灯》是现代与传统的融合,是对古典小说的创造性继承,整合了传统小说的叙事资源。

贾平凹说,《带灯》不是简单地批判谁或肯定谁,是想把中国文化的东西表现出来,把中国文化背景下发生的事情表现出来,提供中国经验,起码在中国人走出这段困境的过程中提供一种“怎么解决”、“怎么办”的经验,同时在表达上注重中国味道,用淡淡的文字,写浓浓的阅历。



国家大剧院首次引进美国话剧

## 翻开美国新闻史的《绝密》档案

本报讯 由美国洛杉矶剧院打造的金牌剧目《绝密》6月4日至6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该剧全名为《绝密:五角大楼的秘密文件》,由艾美奖得主杰弗里·考恩根据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五角大楼的机密文件泄露事件创作而成,描写了一场美国政界与新闻界之间惊心动魄的战争。洛杉矶剧院制作总监苏珊·洛温伯格泽认为:“和传统的欧洲戏剧不同,美国的戏剧更为关注一些植根于社会热点的纪实性作品。”而该剧的复排导演布莱恩·凯特则表示:“美国戏剧重视情节和逼真的故事性,观赏整个话剧感觉是在看一个故事,而不是一出戏,《绝密》就是最好的例子。”

近年来,国家大剧院为北京观众带来了风格多样的话剧作品,但还从未引进过一部纯正的美国话剧,《绝密》的演出尚属首次。这部被称为剧场版“纸牌屋”的美式纪实话剧汇集了玛格丽特·科林、格里高里·哈里森、汤姆·弗丘等多位优秀演员。其中,科林扮演前任《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著名媒体人凯瑟琳·格雷厄姆,正是后者凭借在“五角大楼机密文件泄露事件”中的表现一跃成为美国报业的领袖人物,并策动了日后对“水门事件”的轰动性报道。而事实上,话剧《绝密》的灵感正来源于凯瑟琳·格雷厄姆那本曾获美国新闻最高奖——普利策奖的自传。

(徐健)